

銅鼓考略

葉恭綽題



上海市博物館叢書

丙類 第二種

銅鼓考略



(鄭師許著)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發行

上海市博物館叢書
丙類第二種 銅鼓考略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鄭師 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 澳門 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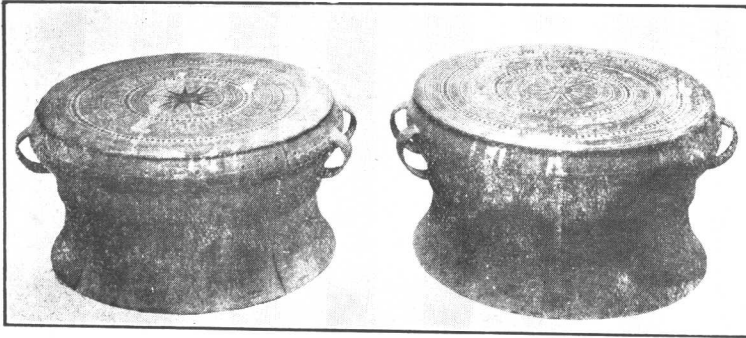
序

胡聲林

博物館事業在歐美自發軔以來，於茲不過百餘年，其間改進之亟銳，邁往之可驚，稍涉足於柏林、倫敦、巴黎、紐約各大都市以迄窮鄉僻壤間，其博物館無問規模之宏陋，靡不活躍於民衆智識之普遍與高深研究之策進；其影響於國家之隆替，民族之興靡，夫豈偶然！民國肇建，外侮內患，曾無甯歲，於國家百年之計，遂多疏略；而博物館事業之運動，亦感蹉後。比歲以還，當軸諸公，奮鬪於國家興亡憂患之間，益事於生聚教訓爲民族復興之算；而博物館事業爲普及教育、提高民族意識、增進研究之要途，提倡之責，要不容懈。肇椿旣受命於市長吳公，爲是途之努力，因感提倡研究，以誘發高深興趣亦爲博物館事業之要着，乃有

上海市博物館叢書之輯，內容性質暫分博物館學、歷史、藝術、考古四項。惟以編行伊始，譚陋謬誤在所難免，是望海內明達子以教正，曷勝厚幸！

圖 一 第



(藝—51)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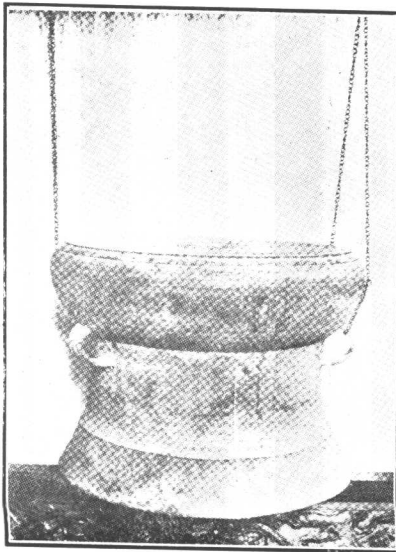
(藝—49)
(古)

鼓 銅 藏 所 館 物 博 市 海 上
藏 舊 齋 窻

號 編 記 登 館 本 爲 目 數 中 號 括 : 注 附

原大
1
100

圖 二 第



鼓 銅 式 一 第 之 見 發 京 東

圖 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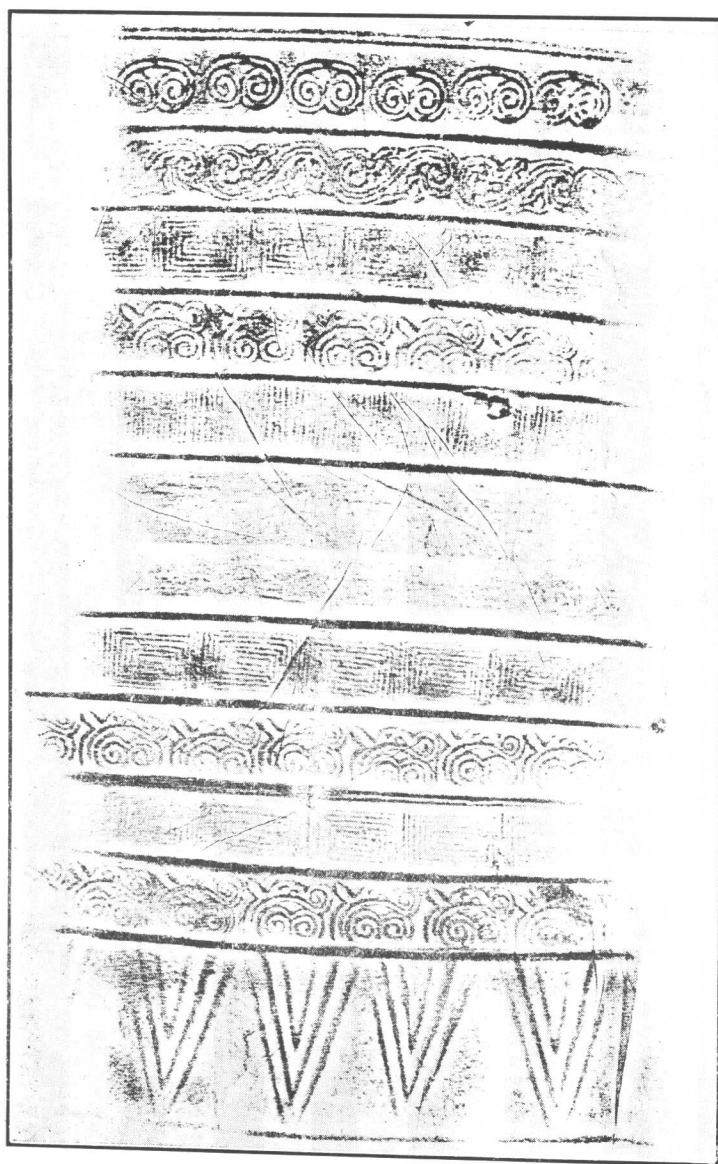


原大
1—5

(禁—53)
古

部 全 紋 花 面 鼓 鼓 銅

圖 四 第



原大
3
—
5

(彝—53)

部 一 之 紋 花 團 胴 鼓 銅

銅鼓考略

銅鼓賽神來，

滿庭幡蓋徘徊。

水村江浦過風雷，

楚山如畫煙開。

✻

✻

✻

✻

✻

離別櫓聲空蕭索，

玉容惆悵粧薄。

青麥燕飛落落，

捲簾愁對珠閣。

✻

✻

✻

✻

✻

——右溫廷筠河瀆神詞

木綿花映叢祠小，

越禽聲裏春光曉；

銅鼓與蠻歌，

南人祈賽多。

※

※

※

※

※

客帆風正急，

茜袖偎檣立；

極浦幾回頭，

煙波無限愁。

※

※

※

※

※

——右孫光憲菩薩蠻詞

此爲唐末詞人歌詠楚越間蠻人以銅鼓賽神之小詞。其他類此者，不一而足。卽如杜牧詩：『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亦說蠻鼓。至許渾送客南歸詩：『瓦樽留海客，銅鼓賽江神；』亦與溫孫諸詞同。銅鼓賽神在唐時，南方確已盛行，故詩詞文人，不惜再三探入詩詞文中，此外如戴紘有詠銅鼓詩，吾輩讀其書者，可藉此窺知一二也。

惟銅鼓發生歷史，向所不明，或謂馬援征交阯時帶回，因以傳入中國或謂諸葛亮征孟獲，創製於蠻中。甚者異說紛紜，演爲神話。則考古之士不容無所用其心焉。

案諸葛亮創製之說，三國志亮本傳無一言，特蠻人之傳說耳。戴紘詠銅鼓詩有云：『問是當年誰所留，盡說傳自漢武侯。』不足置信也。謝堃金玉瑣碎謂：『據傳記所載，蠻夷各有銅鼓，無一語及諸葛亮者。』其言是矣。貴州安順府志云：

諸葛武侯獲銅鼓處在清鎮縣西四十五里。

此亦後世之傳說而已。至馬援帶歸之說，後漢書援本傳云：

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

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依文義解之，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謂得見以銅鑄鼓之法，乃仿爲鑄銅馬者也。下文全表言馬式，非言銅鼓，本傳別處，亦不言銅鼓，疑其時銅鼓實未流入中國。傳末言馬援帶還薏苡事，不言銅鼓可證。明珠文犀，權貴皆望之；矧銅鼓新怪，寧能不言耶？謝啓昆銅鼓考云：『自石湖有伏波所遣一語，（按指桂海虞衡志）遂誤爲伏波所製，且因伏波附會及於諸葛，至於大者爲伏波，小者者爲諸葛鼓，（按指赤雅）眞誤中之誤矣。』又云：『自放翁有用之戰陣一語，（按指老學庵筆記）後人遂誤爲伏波軍器，』（見粵西金石略）其說是也。

唐章懷太子賢注引裴氏廣州記曰：

狸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隋書地理志又云：

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

杜佑通典同，是唐時人著作，所言銅鼓事較詳盡。

其餘諸書，後漢書南蠻傳無言銅鼓事。至晉書食貨志則曰：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

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

南史歐陽頴傳曰：

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頴善，故頴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頴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頴同行，欽度嶺而卒，頴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及陳武帝釋而禮之，……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候。……時頴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

水經注溫水東北入於鬱條注引林邑記云：

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卽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晉書南史爲唐人所著書，年代較晚，故其說加詳，曰：『廣州夷人、寶貴銅鼓：』曰：『獻大銅鼓，累代所無；』曰：『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是晉梁陳間，南方銅鼓大盛，故傳聞愈多也。其言與章懷太子所見材料無異。獨水經注爲六朝人書、與後漢書著者范曄時代不甚相遠，而其言：『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同一故事演變，雖稍有出入，要不能謂爲非取同一史料也。後漢書僅謂『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水經注直謂：『取其鼓以鑄銅馬，』則演變愈明晰矣。

時代愈晚，記載愈詳。唐劉恂嶺表錄異云：

蠻夷之樂有銅鼓，形如腰鼓，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

又云：

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幽州張方直貶龔州刺史到任

後，修葺州城，因掘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於延慶禪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僖宗時，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自是始有言掘得銅鼓者矣。宋太平廣記亦云：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爐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卽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所言與劉氏全同。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條云：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

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鼓。

志金石條又云：

銅邕州右江峒所出，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

范氏自紫薇出帥廣右，以乾道八年三月至郡，留居二年，其所記風物土宜，皆其親見者，其言可信。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是也。其謂：『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與劉氏嶺表錄異所云：『多鑄蛙黽之狀，』所言不殊。迄今出土銅鼓，亦仍以四角有小蟾蜍者爲貴。惟劉云：『鳴蛤乃銅鼓之精，』未免涉於神怪，范氏學人，故不述耳。銅鼓之精美者，於鼓面『四角有小蟾蜍』之外，另有作賽馬狀者，嘗見合肥劉銘傳氏舊藏有之。又陳少白氏亦藏此物，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第六十六期刊有照片。

唐書南蠻傳僅云：

盤盤在南海，曲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鼓、蠡。

宋朱輔溪蠻叢笑曰：

麻陽有銅鼓，蓋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筩，三十六孔，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并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

又云：

溪洞愛銅鼓，甚如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澁缺漬染，名點蠟慢。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亦云：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爲古錢，其方紋如織簞，或爲人形，或如琰璧，或尖

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細畫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爲更點。交趾嘗私買以歸，復埋於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爲鼓，唯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爲士夫搜求無遺矣。

明魏濬西事珥云：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尙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而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似今人家竹培箐，體絕薄，純綠色，紋甚精古，面環繞作鼉黽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受擊處亦平，但略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

好者，近爲稅監獻之內廷，所懸木架，尙存堂之左右，有銅鑄狼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廳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減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遙見，款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焉。

支允堅異林云：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塚，掘之得銅鼓，其旁多鑄鼃眼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原有此體制，今銅鼓兩粵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爲諸葛武侯者，不必盡伏波也。

夷俗最尙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卽至百牛不惜，與售質骨董者亡異。

銅鼓古傳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釵叩之，此所謂金聲，非鑼也。今靈璧侯湯念嵩家有之。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

蠻中諸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鄺露赤雅云：

伏波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弇，其口錦紋精古，翡翠煥發，鼓面環繞作鼉黽十數，昂首欲跳，中受擊處，平厚如鏡，兩粵滇黔皆有之，東粵則懸於南海神廟，西粵則懸於制府廳事。東粵二鼓，高廣倍之，雌雄互應，夷俗賽神宴客，時時擊之，重賞求購，多至千牛，制度同而小過半者諸葛鼓也。價差別矣。

清陸次雲峒谿織志亦云：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峒方能有之，

其大如鐘長筩，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中空無底，亦有土中掘得如坐墩者，週簇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以手拊之，聲如鞞鼓。人傳銅鼓，有此峒之鼓，盜於彼峒，夜見有虎，欲出鬻入，迹之鼓也，還之乃靜。

檀萃說蠻亦云：

馬流人常識其處，常擊銅鼓祀伏波，蓋所祖也。銅鼓與銅船，俱伏波所鑄。船凡五，以其四征林邑，留其一焉，在今合浦。天陰兩船出浮，人常見之，因名銅船湖。伏波將軍廟，極靈異，過者必祠以犬。

近人劉錫蕃嶺表紀蠻第十九章音樂銅鼓條又云：

又名『孔明鼓』，相傳亦爲武侯所造。或謂『後漢書馬援列傳：已載銅鼓之名，銅鼓實非從武侯始。』但西南蠻族，絕無馬援造鼓之說。或許馬援造鼓，武侯亦造鼓，其名雖同，其式則異，蠻人崇拜武侯，做

造其式最多，『孔明鼓』之名，因之乃獨著耳；『問是當年誰所留？盡說傳從漢武侯，』戴絃詠『銅鼓詩，』有此二語，蓋紀實也。其製：全體皆銅質，面平底空，中腰凹束，鑄滿旂幟及各種花紋形狀；中心花瓣突起，形式光潤，如被油脂；兩旁有耳，亦有獅、龍、花瓣、各種形狀。其面有蟾蜍而鑄漢文者，爲上上品。鼓身大小不一，據賓州志（今改賓陽）稱：該邑從前得有銅鼓一具，面闊丈餘，其大可以想見。今苗山所遺留者，大者圓徑四五尺，小者僅二三尺，重量由二三十觔至六七十觔，百觔之物，已極罕見。予家藏一具，高尺有三寸，徑口一尺九寸，重三十二觔。繫其兩耳懸於架上，附之，其聲隆隆，頗爲可聽，然而次品也。

蓋盛行於晉，梁、陳、隋、唐，久所埋藏於地下者，至是每有出土，故聞者記之。明樂明盛有潯江獲銅鼓記略云：

明盛於天啓乙丑奉學政檄至潯，謁郡學，見銅鼓一，登觀風樓，又見其一，形聲同而窳完異，詢之邑博袁鳴謙，曰：歲午端陽日銅鼓灘漁人網於水，莫舉，入水探之，知爲器，舉而出之獻於官，其文質全，守宰令置文廟中。白石山人又得一脣稍窳者，置觀風樓，舊謂馬伏波征交趾，舟經八桂，有二銅鼓，躍入水中，今三千年同日異地而出，此神明之所呵護也。

清代銅鼓出土仍多，頗有可考者，金鉞銅鼓記云：

雍正八年春粵西北流縣農民獲銅鼓一，完好無剝蝕，翡翠丹砂，古色斑駁，非人間所宜私寶者，敬進闕下。是年秋，潯江銅鼓灘之下，啣波鬻浪有隱隱欲躍者，漁人糾衆力舉之，鏗然又一銅鼓也。臯以來告，諦眎審量，高廣輕重，文理色澤，雖皆不逮所獻，而宏壯之模，縝密之文，綠沈之色，要非秦漢以下物也。權之得一千六百五十一兩，繫之高

一尺六寸而稍縮，面徑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尺，其徑腰微束，僅六尺九寸餘，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疊踞，大小各六，重之爲數十二，意取律呂相生而應十二月盈虛之象與？中邊圓紋，亦十二道，疎密相間，內皆細文，不一其狀，旁有兩耳如環，用以昇，通體完整，不缺不窳，似有呵護之者。

綦州府志云：

宜賓縣，橫江鄉水洞坎，嘉慶三年，土人掘獲，今置城北師來山元祖殿，高一尺二寸，面闊二尺，鼓心作蓮瓣，圓六尺，無字跡，通體皆細花紋，四耳缺一，腰微細，一面空，擊之作革音，後又得二面，一存城南土主廟，一存城北崇報寺，式同。

長寧縣，銅鼓，相傳武侯鑄以鎮夷者，今田間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大夫家常購之以爲軒齋古玩。

縣志原按：萬曆元年，巡撫曾省吾平九絲夷，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同時又得銅鐵鍋一口，係酋長阿大所蓄，製甚奇古，識者曰：此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鬻，今三江所出之器，疑卽當年所遺者。

筠連縣，銅鼓，巡司場村人，咸豐二年於土中掘得銅鼓，高尺餘，闌稱之，面有四蟬，空有底，腰微細，擊之其聲如鼓，惟無字跡。考忠武志所載武侯銅鼓圖，其製相似，又讀史方輿紀要：慶符北八十里漢陽山，孔明征南蠻駐軍處，據此，則審爲諸葛軍中所遺，同治元年爲髮逆所毀，高邑焦村亦掘得一面稍小，製亦相似。

雷波廳銅鼓，嘉慶時天姑密鄉人掘地得之，今存關帝廟中，又黃蠟土人掘地得銅鼓四，亦存關帝廟，鼓高尺許，所鑄皆奇文異狀，互相錯蟠，其雕螭刻鷺，猶可辨識，邊際間綴蝦蟆，扣之有剝蝕聲，疑武侯製以鎖蠻者。

遵義府志云：

銅鼓，按鼓四周花草蟲黽紋，古緻斑駁，世傳銅鼓諸葛所遺，此或然也。嘉慶十九年，遵義縣永安莊土人掘得置永安寺，典史陳丙移置桃源山晚香閣中。

南寧府志云：

宣化城北山下，農人犁田得銅鼓土中，形如坐墩而空其下，滿腹皆蒼紋細花，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懸其旁耳，擊之聲極清越，又城隍廟後寢有小銅鼓，形制相同，其文若古鳥篆，而不能辨。

銅鼓宋時已有藏之祕府，明清二代出土者，頗多置於寺廟樓閣，以供衆覽。明張穆異聞錄云：

銅鼓昔馬伏波征蠻物，以山溪易雨，因製之。一懸之梧州鎮府左廊，昔沉潭中，聲震十里，鼓出遂無怒波，人言其爲祟，人舟賴以無險。

鬱林州志又云：

文昌閣中有銅鼓，高一尺五寸，面徑二尺六寸，底徑二尺六寸，邊出廣一寸，腰束減二寸，自邊至中央，凡十九暈，暈間或爲雷文，或爲螺文，或爲五銖錢文，或爲籀條文，中央隆起，內廓有橫斜十字文，沿邊近裏四分強，有六蟾蜍，相去一尺三分，蟾蜍前高一寸，足間一寸二分；後高八分，足間亦八分，鼓身凡三重帶二十七暈，暈間文與面同，兩旁近上有耳，前後對出，近下亦有耳，左右對出，文如貫索形，模中度鏤刻精工，色如綠沉，土花斑駁，蓋西漢時物也。多塘嶺北帝廟石脚堡巖額廟，亦有鼓，較此爲差小耳。

銅鼓之埋藏於地下者，或不盡出於自然，疑皆蠻人所自理也。其故亦可得而言。晉書稱夷人寶貴銅鼓，隋書地理志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又謂獠鑄鼓既成，乃招致同類，來者盈門，其重視銅鼓如此。唐書云：

西爨以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無賦稅，刻木爲舟，見貴人無不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此言銅鼓與牛馬，同爲蠻人賞功之用，是銅鼓乃蠻人唯一寶貴之財貨矣。故蠻人獻貢，亦常以銅鼓。志林云：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嶺表錄異太平廣記言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宋史蠻夷傳西南諸蠻條云：乾德四年，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

又南丹州條云：

淳化元年，洪耆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盃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紐，旗一帖，繡真珠紅羅襦一。

蠻人寶貴愈甚，而漢人搜求亦愈烈，宋時已有藏之祕府者，老學庵筆

記謂此『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異林稱土豪富室，重價求購，卽百牛不惜。湧幢小品謂上上者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赤雅又謂重貨求購，多至千牛。梁歐陽頎征蠻，已以獲銅鼓爲戰功，謝啓昆銅鼓考云：『所謂遷其重器也。』宋史五行志謂熙寧元年，元豐元年，橫州共獲古銅鼓一十七，七年十一月，賓州獲古銅鼓一。又明史劉顯傳云：

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擊鼓山嶺，羣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

漢人搜求愈烈，蠻人寶貴更甚。其所以埋藏地下者，此其故歟？近人劉錫

蕃嶺表紀蠻云：

卽數十年前，黔桂邊境一帶，往往掘得此物，連續埋藏，動輒以數十計，均在深溪密箐之間。吾人由此推測，可知有鼓者，亦不限於行軍，凡民多財而好之者，皆可以鑄。故其物之多如此。其所以得於林間，大概由蠻民屢服屢叛，官軍攻剿戰事激烈，蠻人自度必敗，以其笨重難攜，遂埋於僻地。一敗之後，倉卒奔逃，或遠徙不還，或寨焚人殲，地盤爲敵所據，而此物遂亦久藏於地中，不復出世，年湮代遠，山洪衝圮，始復爲後人所得耳。說者謂『係武侯所埋，以其張疑兵驚敵人之用；』一統志又謂『此物出於融縣，係武侯散埋以厭獠人，』其詞迂而且誕不足信也。近來交通日密，漢人入苗山者，收買殆盡，得之益不易矣。其說近是。按嶺外代答稱交趾買歸後，復埋於山。蠻人因寶貴而埋藏之，固信而有徵。

今南方地名銅鼓者甚夥，大抵均因銅鼓得名，水經注引林邑記稱有地名銅鼓，因銅鼓而得名，卽在今廣西。西清古鑑有銅鼓圖十四，云：

此器，今世多謂之「諸葛鼓」，蓋武侯渡瀘後所鑄。然考馬伏波平交趾，亦鑄銅爲鼓，則先諸葛有之矣。今嶺南一道，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博白有銅鼓潭，則因以爲地名矣。大抵兩川所出爲諸葛遺製，而流傳於百粵羣峒者，則皆伏波爲之。今未能差別，統名爲「漢銅鼓」云。又按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春州守林靄得之峒戶，以獻綱，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蟆等紋，旁設兩耳，語與此合。而是鼓更作騎士，科洗乘而馳，旁挾一馬，則舊說所未有也。

博白縣志云：

銅鼓潭離縣治北二十里，深十餘丈，西岸石壁峭立，舊傳有銅鼓浮出，聲聞數里，鄉人來觀，久之復沉。明弘治間，邑人獲其一，解送制

府。

柳州府志云：

銅鼓山在融縣城西南二十里，舊傳諸葛武侯埋銅鼓以厭蠻獠，後人得銅鼓於此山下，爲銅鼓灘。

安順府志有云：

明一統志：威清衛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

其他小地名作銅鼓者，恐猶不止此，古時南方銅鼓之盛行，於此可見，後人因得銅鼓而名其地，其重視銅鼓，亦於此可見也。

諸書漫謂銅鼓古蠻人所用，然所謂古蠻人，時代實不明，蓋文獻無徵久矣。苗族說略謂：『有謂自秦漢以來已有鑄者，』（見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九期）未審何據。以吾思之，大抵在前代之世，南方蠻人，固已

有用之者，五胡亂華後，異族文化，蠶集而至，乃漸由傳聞而得目睹，故言之日益加詳。然其盛行時代必不出由晉至唐卽公元三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其後漸次衰歇，得之者視同古玩，非復日用品矣。惟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

予初見梁歐陽頎傳稱頎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鑿鑿，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今用之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據陸氏之說，當時蠻人所用鼓，非古物，似非土中掘出者，殆宋時蠻人尙有鑄銅鼓者。宋史蠻夷傳撫水州條云：

融州蠻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

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

所言與廣州記隋書同，陸游之言疑是也。惟所鑄當不如前代之多，銅鼓之流傳亦遠不如前代之盛，得之已不易，故宋人藏之祕府，而宋史於銅鼓獲得又不惜再三記之也。

至其製作之法，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略有言及，惟語焉不詳。其言曰：
…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復鑄銅爲大鼓、飛簾、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雖其所記爲赫連勃勃一姓之事，其他蠻人或不如此；然蠻人製銅器之求精麗，於焉可見。蠻人旣寶貴銅鼓，製作自必求精細，求之過甚，乃至不惜

殺工匠數千。今人得一古器，玩摩不忍釋手，豈知前世工匠，固有以此流血者乎！

銅鼓之用途，大抵爲賽神樂器，吾人讀溫孫諸氏小詞已明。宋史蠻夷傳西南諸蠻云：『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神鬼，詔釋其銅禁。』則銅鼓爲祀神之用，更信而有徵。太平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曰：『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扶南天竺類皆如此。』而黔苗圖說則云：

捕籠狛家貴陽南籠安順三府，定審廣州二州皆有之，以十二月朔爲大節，歲時擊銅鼓爲歡，掘地卽得銅鼓，武侯南征時所遺者，重價爭購。

貴州通志又云：

狛家……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卞光，一曰青狛……歲時擊銅

鼓爲歡，土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價爭購。

貴陽府志亦云：

狎苗有二種，曰卞光，曰青狎。貴陽惟有青狎；在府屬者，居阿所平山瓦窰諸寨；在長寨者，居者貢谷龍擺倫古羊諸枝；在定番者，居抵娘、老麥諸寨；在大塘者，雜處各土司地；在開州龍里貴定者，與漢人零星雜處；在貴筑、修文者，散居四境，亦與漢人雜處。……歲首，以銅鼓爲歡，土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價值爭購之。是銅鼓不特用祀鬼神，且爲歲時歡樂之用矣。考隋書地理志則云：

自嶺以南，……並鑄爲大鼓，……俗好相較，多構仇怨，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都老」，羣情推服。

宋史蠻夷傳撫水州條亦云：「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老學庵筆記謂蠻人用之戰陣祭享，嶺表紀蠻又云：

今蠻人集議軍警公益一切事件，亦以撞擊銅鼓，爲其唯一號召之方法，流俗相沿，猶不稍變，但此物不盡用之於行軍集會，私家娛樂，亦嘗製之。

是銅鼓爲蠻人唯一重要之樂器，亦唯一之信號也。《隋書》《宋史》皆謂有鼓者號「都老」，羣情推服，湧幢小品謂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寨主。蠻人尊重銅鼓如此，宜乎其寶貴之矣。

《桂海虞衡志》稱邕州產銅取之甚便，故蠻人盛用銅器。《晉書》則云：「小人貪利，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又似南方無銅，輾轉販入者。即宋史亦作如是言，疑莫能明矣。

至於西洋學者之間、最初於銅鼓問題作考察者，則爲哥祿貝氏（Gou-loubew）。哥氏在安南河內遠東史前學會議席上，嘗作關於銅鼓之起源及其流布一題之演講。氏力謂銅鼓表面之花紋與漢代青銅器之紋樣相類，而

銅鏡尤絕似。其中如鳥飛之形，與中國山東孝堂山或武梁祠石室雕刻中所表現之飛鳥圖，手法相同。又其吻端爲菱形之水禽類圖樣，蓋自漢甄鸞（卽水鳥）銜魚之吻之圖樣轉化而來。又謂銅鼓之起源，在北安南等山地，受來自中國之工匠之影響，因而發達。安南土人普通安置於籐製置台上之大鼓，爲其原型。今日住居北安南山地之土著民族之間，尙有行之云云。哥氏爲最初對於銅鼓原型作考察者，其着想之點，不得不認爲超拔，但謂久已稱爲學界之謎之銅鼓問題，因此悉已解決則猶未也。

銅鼓一物，在東亞爲來歷不明之古物，於西洋學者之間，早已惹起注意，在五十年前東印度羣島各地發見銅鼓之時卽已開始。一八八四年邁爾（A. B. Meyer）著東印度羣島之古代遺物（*Altertümer aus dem ostindischen Archipel*）一書，其中已介紹羣島發見之銅鼓及今日歐洲之所存者。已而邁爾與其助手夫瓦（Foy）氏合著一書，名爲東南亞細亞之青銅鼓（*Bronzega-*

uken aus Südost-Asien)，於一八九八年刊行。其後夫瓦氏又於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在維也納（Wien）人類學會雜誌（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eschaft in wien）發表東南亞細亞之古代銅鼓（Ueber alte bronzetrommeln aus südost asien）一論文，繼續其研究。但認此類銅鼓，與出自中國史料之銅鼓爲同屬一類，於是此問題遂移於『支那學者』之手，而開始其激烈之論戰。

先是，十九世紀末年稱爲第一流『支那學』者夏德氏（Friedrich hirth）於一八九四年函詢維也納專門銅鼓研究家黑智爾氏（Hegel），因得錄送關於銅鼓之中國學者之學說；一八九六年夏德氏爲巴斯棠（Bastian）祝賀論文集（Festschrift Fur Adolf Bastian）寄稿著趙汝适所見之海南島（Die Insel Hainan Nach Chau Ju-kua）一篇小論文，其中註文有云：

在今日爲中國南部西部及安南最有趣味之古物銅鼓，恐本爲中國工藝

品，後其製法流入半島住民之手，因而依據模倣者。

但謂此時尙未充分觀察遺物，不敢逕取中國人之記載以爲考證，因而斷爲一方面之意見，先將收到黑智爾氏之私人通信公開披露。此私信於中國學者關於銅鼓之考證略爲介紹，在觀察遺物未充分之前，暫時贊同其說，以銅鼓之製作，歸功於馬援或諸葛亮，蓋依中國人之通說也。

反對夏德氏之說者，爲荷蘭「支那學」者狄葛樂氏 (De Groot)，一八九八年一九〇〇年先後用其國語及德語發表論文、題爲東印度羣島及東京亞細亞大陸銅鼓考，主蠻族起源說。今爲譯述如下：銅鼓在一世紀之頃已流布於廣東之西南隅（後漢書馬援傳）。四世紀上半稜，乃盛行於長江沿岸南部。（志林）。當時南方銅鼓製造極盛，廣州住民用銅大半爲鑄銅鼓，貴重現金，不絕投於熔爐，因此政府禁之。（晉書）更有南方狸獠之間，銅鼓亦甚流行，每當大饗宴，輒以誇其盛，或戰時鳴之，以徵集人衆等（廣

州記、隋書）。次之，南方蠻夷、屢屢進獻（嶺表錄異、宋史）。蠻夷疾病、用之祈神求愈、因此十世紀時，朝廷乃解除製造買賣之禁（宋史），在十二世紀時南方已視爲古物，俗傳因有馬伏波將軍創製之說，（桂海虞衡志）。更有元豐中湖南西北、卽洞庭湖之西、有雲雷文銅鼓發見。推定爲與祈雨儀式有關（湖廣通志）。又次銅鼓之上多鐫帶甲武夫（樂書溪蠻叢笑），此亦極可重視。最後夷蠻之間，於銅鼓乃信爲威權、勢力、門地之徽識，失之則去蠻運，而諸葛亮製作之傳說，亦並起矣。（明史劉顯傳）。狄葛樂氏歸納此等文獻，謂銅鼓爲公元之初，廣東西南蠻人所創作，其後漸爲廣東以西廣西貴州湖南諸省所使用。此決非長江以北諸地所產。而與今日安南、東印度羣島及中國所發見者同一式樣。且銅鼓之上，既無年號，又無銘文，其屬於漢字及中國作風之雲雷紋及鶴、龍等文樣者，實爲破格。此又不可不注意也。蓋銅鼓固爲蠻人所手創，蠻人歸順中國以後

，採用其文字，或亦以之鑄造銅鼓。狄葛樂氏之推定如此。至於東印度羣島之銅鼓，由何處發源之一問題。邁爾氏嘗創爲柬埔寨（Cambodia）發源說，以柬埔寨爲銅鼓發見之焦點，而排擊森民諾氏之印度傳來說，結論謂自蠻族聚居之處所移入者。以爲在銅鼓上之象、孔雀、櫻欄等，中國南方皆產之。昔日本爲蠻人居住地，至今猶然。最後又論及用途，謂中國寺院用之，暹羅王宮佛事時亦用之，安南內地諸種族土人今日仍尊重銅鼓，與中國史料中所載之南方蠻族，其狀態不少變異，此可注意者也。又謂附於銅鼓表面之蛙，意爲呼雨，又舉安南文獻爲證。關於樂器用途，中國文獻向守沉默，此說甚足珍貴。被又列舉文獻非難夏德氏之說，謂馬援因所得青銅利器戰利品改鑄而爲銅鼓，其後遺存於蠻人之間，其說實不合理。又攻擊諸葛亮鑄造說，謂爲依據諸葛亮歿後千三百年所筆之於書之傳說立論，全無科學根據。狄葛樂氏之論，當時以充分材料立腳、所說正當，雖在今

日，猶價值不墜。

夏德氏接此攻擊後、乃發憤讀一九〇二年黑智爾關於銅鼓說之集大成諸作，辯護其舊說，於一九〇四年刊行中國人關於銅鼓之見解 (Chinesische ansichten über bronze-trommeln) 小論一種。此中略謂馬援所過發見銅鼓。又此等地方暑熱甚厲，革鼓弛皮消音，因作銅鼓；馬援沒收蠻人所用兵器，依據之以作銅鼓以賜蠻酋，使之爲附近諸蠻之宗主國。引用廣東新語所說，以爲理由，實際中國文獻中，有以白鷺鼓吹以賜有功者或外夷之例，又有以賜州縣而使之威脅夷狄之例，使用以鷺爲飾之革鼓，因而銅鼓之上亦有水禽類圖案，銅鼓之製作優美者，其文樣全受中國影響，非蠻人所發明，不外爲馬援或諸葛亮所製作云。夏德氏之說相信中國晚出史料，有非純粹學術解釋之嫌。夏德氏用力雖勤，但謂銅鼓爲馬援或諸葛亮所創，其說終不爲吾人所信。反之，銅鼓之文樣及其形式固極富外國作風。

比較而言，狄葛樂氏之蠻人起源說自較允審。但是蠻人創製，其後如何流布鄰近諸國，如何弘布於東印度羣島，其經行路徑如何等等，又爲極困難之問題也。謂狄葛樂氏之論文，已能解決此等問題，則又不然也。

與『支那學』者之研究相並行者，又有考古學家對於銅鼓實體，作進一步之研究。黑智爾氏在一九〇二年刊行東南亞細亞古代金屬鼓 (*Altmetallrommeln aus sudostasien*) 大著時，舉當時現存銅鼓一六五品，分之爲四類：其第一形式分三部分，自橫看之，上部膨大，中部垂直，下部爲截頭圓錐；第二形式，上部至中部接合點之角度，漸爲S字形。下部續爲圓錐部，其上部安置青蛙或騎馬像；第三形式多小形青蛙，圓胴自大而下擴爲小；第四形式則具備中國要素而形小。第一式爲最古，附有異形鳥類裝飾或人物或舟等文樣，分布東京中國南部等地。第二式則發見於中國南部及東京。第三式現行於卡蘭 (*Cullen*) 族之間。第四式中國最多云。此種黑智

爾分類法，今日猶大體不動。次爲法人巴門特爾 (Parmentier) 氏、於一九一八年遠東學院雜誌中發表古代青銅鼓 (Anciens tambours de bronze) 一論文，於黑智爾所集大成之外，追加漏載銅鼓二十三品。其中所發表屬於第一式者，有一從東京河內州 Ngoe-lu 寺購入而現歸學院博物館所藏之銅鼓，(見卷首第二圖) 其文樣複雜之點，爲從來發見品之冠。巴門特爾氏嘗詳爲記述：以其象鳥而異樣之戰士，與見於新幾內亞之巴布亞族習俗中之假裝祭儀者比較，與其圖中居住安南山地之摩族 (Mo) 等相似之習俗甚多。要之：其圖爲示在祖先動物保護之下舉行戰狩，爲表顯村中執



圖船之內鼓銅 Ngoe-lu

事之蠻人生活之縮圖云。

關於此等銅鼓諸研究之後，哥祿貝氏乃提供新說。哥氏謂東京之南北安南等爲銅鼓發生地。而其製作之起源則由於來自中國之工人所影響。此說實可認爲夏德說之復活與修正也。以銅鼓之製作，不歸功於馬援或諸葛亮個人，但謂其在公元一世紀左右於中國起源。此說大半可從。然而關於哥氏之解釋，種種可疑問之點尙多。第一，哥氏所言鳥文及其他文樣，與漢代文樣符合，其言必不可通。寧可謂爲銅鼓製法，全體爲一異樣文化系統所產生，其可能性甚多。又銅鼓製作之年代，安南清化 (Thanh Hoa) 東山 (Dong-Son) 之發掘，不得稱爲純粹學術之事，最遺憾者，直謂其時爲其發生時代，使人不得不甚爲躊躇。又今有一難點，銅鼓既爲安南東部之一隅印度支那長頭人種一族之間在受中國工人影響之下而發生，然則又何故北上而傳播於居住中國南部山地蠻夷種族之間，此一說實成問題。大抵中

國南部原住民，自北向南移動。今日東京山地之蠻夷種族爲在明代時從廣東或廣西南下者。在漢代實居於北也。蓋此種族者在東京時乃受安南文化之影響；然彼等之間尙有一宗主國，可爲說明此事之貴重材料，此由南而北上之文化傳播路徑、自可十分證明。至主張青銅器文化自北而南下傳於安南者之一方面，不得不推論土人之青銅器之一形式，逆轉路徑，認爲北上傳播爲甚困難矣。又自形式方面而言，哥氏以銅鼓之製作爲自安置於籐製臺上之普通大鼓演變而來，此說甚有趣味。但此等論證亦甚難立也。銅鼓橫掛吊下以便鳴擊之習俗，在今日尙有可見，即普通之廟寺尙多如此也。若銅鼓製作之初，即用此法，則鼓之上部與鼓胴初接之處，便可考得爲同一固體所成。勿論表面上安放青蛙，其事卽已發生；其下部之構造與置臺，亦卽可聯想。其臺式，已爲文樣化而已。哥氏所言，蓋因後世製作，使用置臺意匠，以此等事實追溯古代，謂當初實由安放於籐製置臺上之普

通大鼓演化而生銅鼓之形，其推論甚爲無理。要之：關於銅鼓之起源及其流布問題，哥氏之意見，亦不能十分解決也。

又以東南亞細亞石器時代研究著名之革爾登氏(Heine-Geldern)在“Asia major”雜誌一九三二年號發表最古印度支那金屬鼓之意義及其由來一論文介紹哥氏關於北安南之青銅器時代論文而批評之，大體承認哥氏所稱 oe-lu 銅鼓上所圖爲表死者祭儀之說。但另一方面解釋，以銅鼓爲一種財物，推演爲富之形成，或結婚式中亦如其他貨幣之配搭。即在東山所發見銅鼓之中，與大形者同時發見之一種小形者退化之形式，此時代銅鼓、已爲數世紀發達後之產物。其起源當在紀元之前。因不信馬援製作之說。哥氏之印度支那人製作說，謂爲在同種族侵入安南之公元前二千年時，其年代不相符合。又謂在東京安南地方，若依中國文獻，以公元一世紀爲當時安南人之祖先駱越人所居住，東山文化者即駱越人所有之文化。其持論如

此。

革爾登氏以爲銅鼓使用之目的、不僅限於葬儀及祭祖先之用，而信爲東亞諸民族之初期部族制度時代，銅鼓實爲普遍存在寶器之一種；因爲貴重視之，所以爲死人殉葬物品，不得解說埋葬爲銅鼓之主要目的云。又關於印度支那人爲銅鼓之製作者一說，革爾登氏所反對亦不必妥當。其言分安南人爲今日居住北安南山地之原住民族與居住平地之普通安南人兩種，前者爲固有安南人，卽印度支那人種所孳生者也。安南人卽普通印度支那人與黃色人種相混合者也。革爾登氏之說蓋與哥祿貝氏不相背馳。又革氏之說，以爲印度支那人南下之時當屬公元前二千年時，其年代觀亦未可採爲定說。因而革氏從年代上之反對說，亦無十分根據也。但以東山文化，歸於駱越人，革氏所考證，大體穩當。又其說以銅鼓之起源，追溯在數世紀以前，其推察亦甚正確。但東山文化中銅鼓之發明，果可歸於駱越人所

爲否，此種判定，因其人種在古代史上無從知悉，此爲最感困難。革氏關於此點，信賴奧盧騷氏 (Leonard aurosseau) 關於安南人起源之研究所說以駱越爲擴布於古代中國南部之越人之南支族。詎知奧氏之研究，尙不得信爲十分科學之研究也。要現時銅鼓問題可謂尙未解決；不過僅僅可以測知在紀元前後盛行於中國南方蠻族之間而已。

至南方蠻族如何形成，疑是由於苗族土族 (Tib) 等所成印度支那系中之一種族也。且經後者之手，銅鼓乃能傳播於東印度羣島大約是以銅鼓爲器物，經當時殖民者或貿易商人之手轉運於東印度羣島也。故欲解決銅鼓之起源、流布問題，東山之發掘，猶嫌不足。今後第二第三青銅時代之調查，在中國南部及安南各地實爲必要。例如最近香港芬氏 (Fin) 發掘之結果，發見中國青銅文化之受廣東影響者、其事甚古，認爲與廣東有密接關係之東京地方，其青銅器文化，必不能抑置於公元一世紀時也。尤特殊者

、如東山文化之各層，於混合地帶內，古代遺物混入新遺跡中，有發見之可能性。要之：吾人依據東山發掘，其銅鼓之成立年代，若限定於公元一世紀者，尙堪躊躇者也。因之、認爲發生於此附近地帶，殊爲危險。

由此觀之：西洋學者之間，關於銅鼓之起源，其辯論已四五十年，而其一致之結論，尙不能得。僅知紀元前後，南方確已應用，馬援諸葛亮皆不得爲創製之人、至是否出自蠻族或中國人之手，又無定說。此亦與中國史料相去不遠也。要銅鼓一問題，比較之材料尙不多，姑假定如上，以俟新材料之發現。至於花紋之比較研究、化學成分之分析研究，則又此篇之所不及。

此次上海市博物館所藏者，計有八品，爲吳憲齋遺物，蓋憲齋官廣東湖南時所蒐羅者。形如坐墩，中空無底，卽所謂自安置於籐製置臺之上之普通大鼓演變而來者歟！全面及胴圍遍布花紋，惟無款識，其爲南方蠻鼓

無疑。茲冠其形式圖樣及花紋拓本於卷端（見第一第二第四圖）並表其大小尺寸於下，以供世之有志研究者。

藝古	藝古	藝古	藝古	藝古	藝古	編號	長
00051	00050	00049	00048	00047	00046	度	
46.6 c.m.	50.8 c.m.	46.7 c.m.	46.5 c.m.	50.8 c.m.	47.0 c.m.	鼓面直徑	
148.2 c.m.	161.0 c.m.	148.2 c.m.	148.0 c.m.	160.8 c.m.	149.2 c.m.	鼓面周圍	
133.2 c.m.	146.8 c.m.	135.3 c.m.	133.7 c.m.	146.1 c.m.	134.3 c.m.	胴圍	
46.2 c.m.	50.4 c.m.	47.3 c.m.	46.3 c.m.	50.2 c.m.	47.0 c.m.	圈足直徑	
145.5 c.m.	159.0 c.m.	149.1 c.m.	146.0 c.m.	159.8 c.m.	148.2 c.m.	圈足周圍	
25.6 c.m.	28.5 c.m.	27.1 c.m.	26.4 c.m.	27.7 c.m.	26.1 c.m.	鼓高	

藝古 00053	藝古 00052
47.3 c.m.	47.0 c.m.
151.0 c.m.	149.0 c.m.
140.7 c.m.	130.2 c.m.
47.4 c.m.	47.2 c.m.
148.8 c.m.	149.2 c.m.
26.5 c.m.	27.4 c.m.

校後附記

本書付印後，得本館楊寬幹事面告，謂關於銅鼓文獻，尚有福開森（John C. Ferguson）著之周鍾鼓考及鳥居龍藏著苗族調查報告中第八章銅鼓兩文，或有不少材料。福氏文載大公報藝術周刊第四十一期中，嘗懇本館舊同事司徒喬馮伊湄仇儷代覓，尙未賜寄，未得寓目。鳥居氏書經以一晝夜之力，細讀一通，其所述海外學者之研究，尙有爲管窺所未及者，特爲節鈔，作爲附錄，以供世之有志研究者並讀焉。

* * * * *

余嘗於中國貴州省貴陽附近得銅鼓一，後收藏於東京帝國大學理科人類學教室；於是余乃作銅鼓之研究，並記出研究結果。……

日本學者中，注意於銅鼓之研究者，亦不乏其人，若舉其最著者，則首爲松崎復（益城）氏；氏在其所著慊堂遺文（文化七年）第二卷中，有

銅鼓考一章，在當時頗具卓見，茲摘錄之：

宮川領主堀田侯，舊藏銅鼓一，高九寸，圍五尺四寸，爲三歷象，面如拓文，叩之鑿鑿，不似銅聲無底，仰之可盛水爲盤。西清古鑑云：此器，今世謂之「諸葛鼓」，蓋武侯渡瀘後所鑄，然考馬伏波平交趾，亦鑄銅爲鼓，則先諸葛有之矣（卷三十七）。大抵兩川所出，爲諸葛遺製，而流傳於百粵羣峒者，則皆伏波爲之。今未能差別，統名爲「漢銅鼓」云。余曰：古鑑所說爲懸斷。三國志諸葛本傳：後主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月渡瀘，其秋南中悉平。自春至秋，往還五六千里，平定四郡；日少事殷，孔明雖多材，何暇鑄此多鼓哉。……又後漢書馬援傳，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此鎔銅鼓鑄爲馬式，或用銅鼓鑄法鑄此馬式耳，非鑄銅爲鼓也，且云：流傳於百粵羣峒之

鼓，皆援之所爲不亦妄也哉！援傳注引廣州記。隋地理志又有此事云：「嶺南廿餘郡，狸獠鑄銅爲鼓，……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其俗尊有鼓者，號爲都老，羣情推服」。近世，明末有鄺露者，爲獠獠雲韞娘記室，作赤雅二卷，亦云：峒中酋長生子者，鑄銅爲鼓。卽隋書所載「都老」也；蓋兩湖廣貴州雲南，東西五六千里，犬牙聯絡，多蠻夷巢窟，或曰「獠獠」，或曰「峒苗」，此唐虞三苗，殷商之鬼方，周之庸蜀、羗髻、微盧、彭濮之屬所卵育其俗頑獷猛，歷代以爲羈縻州，則此鼓也；不特諸葛伏波之所創，從來西南蠻夷所傳鑄，自秦漢前以至鄺湛若所記，亦皆此物也。蓋古鑑所載，凡十四鼓，銅色品格極高，故以爲漢鼓也，此鼓，余嘗借覽月餘，銅氣未化，不出於七八百年物，蓋唐宋間所鑄也。西條三堀氏得

拓本，裝爲立幅，屬題，遂作銅鼓考，書其顛還之，庚午正月。

明治十六年，大給恆氏著古銅鼓考一書，此書關於古銅鼓之考覈，極稱該博，錄其一段如次：

……若夫伏波馬式，則慊堂所說是，然其謂用銅鼓鑄法則非，何則？殷周以來，鑄銅之法具備，何苦倣蠻夷法爲。思西南蠻夷，久有銅鼓，由馬援孔明獲之，其名始顯，故後世謂此鼓之類，統名爲「漢銅鼓」乎？有兵器，有樂器，此鼓爲何器，未得其考，姑記之以俟他日審定云云。

苟銅鼓非創自漢族，而實由印度支那及中國南部蠻族所手造，則適爲苗族研究上之大好材料。

現今關於銅鼓作學術上之研究者，首推德國與荷蘭學者，吾人如欲知其研究已達於如何程度，則須於現已刊行之彼輩著述中求之，茲按次錄其

篇名如左：

- (A) A. B. Myer: Alterthümer aus dem ostindischen Archipel und angrenzenden Gebiet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jenigen aus der hindusischen Zeit Leipzig 1884
- (B) T. de Lacouperie: on Antiquité and baeced bronze bruns of Non-China?
- (C) F. Hirth: Ueber hinterindische Bronzetrömmeln 1890
- (D) F. Hirth: Alte Bronzepakken aus Ostasien Wien. 1891
- (E) F. Hirth: Die Insel Hainan nach Chao Ju-Kaa. Berlin. 1896
- (F) J. D. E. Schmeltz: Bronze-Pakken in Indischen Archipel. Leiden. 1896
- (G) Myer und Foy: Bronzepakken aus Südost Asien. 1897
- (H) J. J. M. De Groot: Die antike Ketetrommen in den Oast-Indischen

- Archipd eu of het Vasteland Van Zuidoost-Azie-Amsterdam. 1898
- (I) W. Foy: Zu den Bronzepakken aus Südost-Asien. Dresden. 1900
- (J) J. D. E. Schmeltz: Naticz uber die Trommeln von Allor. 1901
- (L) J. J. M. De. Groot: Die antiken Bronzepakken in Ostindischen Archipet und auf dem Festlande von Südostasien Berlin. 1901
- (L) F. Hegel: Alte Metalltrommeln aus Süde Asien. Leipzig. 1902
- (M) W. Foy: Über alte Bronzetrommeln aus Südostasien. Wien. 1903
- (N) Van Hoëvell: Mitteilungen über die Kesseltrommel Zu Boutobangan Insel Saleyer. Lerden. 1903

以上十四種論文，於今日銅鼓之研究上，均極重要；其中，除（A）（G）及（L）外，概由學會及其他雜誌發行；（A）文雖不限於銅鼓之研究，但其於銅鼓研究之歷史上，極有價值，是書初出，頗引起歐洲學者之注意

而從事於此，觀於此後研究銅鼓之論文，陸續出版，可以知之。

其中最主要者爲(G)，其以今日發現之銅鼓，製爲圖版，此於銅鼓研究史上，實可大書特書也。

次則爲 Groot 氏之論文(H)及(K)，最初氏寫(H)篇時係因荷蘭文，(K)篇則用德文寫成。後者曾載柏林東方語學校報告 (*Matth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in Berlin IV*) 中。氏以 Myer 與 Foy 合著之論文(G)爲基礎，更參以中國歷代之載籍，研究極其精湛。博採漢籍以自由徵引考證而從事於銅鼓之研究者，捨氏以外，尙不見其人，卽日本人中，亦未見有孜孜研究漢籍中之銅鼓如氏者。氏論文之要點，則在將銅鼓之地理學的分布、花紋、突起物及記載中之事實，作極密之研究，吾人讀此，極感愉快，蓋價值極高之作也。

日本坪井九馬三博士，曾將此文譯成日文，題爲東印度諸島及東南大

陸之古銅器考，載於史學雜誌第一三篇第三、四、五等號；此譯文於日本學者銅鼓研究，極有貢獻，且使其了然於此中之趣味。又博士著有史學研究法（二二八——二五〇頁）一文，亦有關於此項記載。

自 Groot 氏之論文發表後，關於銅鼓研究，乃有更可驚之發展，於是 Hegel 氏之（L）論文遂出問世，氏與 Foy、Groot、Meyer 三人，爲今日有名之銅鼓研究家（D）論文雖曾涉及此事，然遠不及此篇之重要，余現乃記 Hegel 氏論文之內容如左。

氏之論文（L）原分兩部，一爲文章，一爲圖版，前者共八章，頁數二四五。卽：

I. Einleitung

II. Aufzählung der bisher bekannter Trommeln.

III. Einteilung in Typen.

IV. Geographische Verbreitung

V. Beschreibung des Materiales

VI. 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en.

VII. Herkunft and Bedeutung der Trommeln.

VIII. Literatur.

吾人讀此文時，對於銅鼓之形式、花紋、化學成分以及其地理學的分布等，即可洞悉無遺。其另一冊圖版，共有圖四五，其中有八圖爲銅鼓之照片，餘則爲銅鼓之耳及花紋之解剖圖。氏所用爲論文材料之銅鼓，不限於今日世界上尚存之實物，即圖籍中（如西清古鑑）之所有者，亦搜羅於其中而不使遺漏。此論文可謂最完備且爲龍然巨帙矣。此書苟存，餘書大可不要。吾人實抱此感。

有此論文，吾人獲益實多，然其中最能啓發吾人之知識者，厥爲其依

照形式分類一事。據氏之意，銅鼓可由其形式不同，別爲四類，茲說明其相異之概略如次：

第一形式

此形式爲銅鼓之基礎形式，氏所取作材料者，約三四具（西清古鑑有圖），言其特質，則形狀方面，大都胴部高，表面及胴部附以各種花紋，輪廓中圖有人、獸、鳥、魚、植物、房屋、器具及船等，而表面更現有蛙及其他動物；此第一形式除上述圖畫花紋等外，餘則較其他形式爲最具古風。至其地理學的分佈，則達於中國南部、東京、馬來羣島及其極南端新基尼（New Guinea）島附近之奎島（Cayes）。

第二形式

此種形式，其變化較第一形式爲少，圖畫及其他方面，頗有省略。其地理學的分佈，主要的爲中國東南部，北則終於長江口之希伯島。（譯音）

第三形式

此種形式者，現今英屬緬甸之 Rothen Karen 及 Weissen Karen 之間，以及老撾地方之 撣族 與 盤谷 附近地方，均尙用之，主要者皆在宮中及寺院等。此種與前者，其形式及花絲甚類似表面亦描蛙狀，似由前二者脫化而來。

第四形式

此種，在形式上略有變化，胴部較短，表面之蛙圖，亦有省略及蛻變之處，或則無之。花紋亦混入漢族之氣分；表面及胴部，無人物、獸、鳥等圖；形狀則頗類似中國之太鼓，且現有中國文字及中國繪畫，故此種銅鼓顯與漢人有關係，而其發掘地多在中國南部地帶，接壤貴州湖南兩省之廣西北部苗族，至今尙有使用之者。

以上乃 Heger 氏依銅鼓形式所行之分類，彼又曾就以上各式之銅鼓作

化學的分析，其結果如下表：

形 式	銅	鉛	錫
第一形式	60.82—71.71	14.25—26.69	4.90—10.88
過渡形式	76.02	10.64	12.39
第二形式	71.15—79.02	16.54—16.69	8.85—11.94
過渡形式	73.19—78.70	7.55—10.94	11.72—15.44
第四形式	73.30—85.48	3.75—14.80	9.19—17.60

此項研究，價值極高，吾人三復之可也。

一九〇三年，Foy氏嘗於 *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Wien* 上，發表其對於Hegel論文之意見，又其對於銅鼓之各形式，亦有所批評，讀Hegel之著作者，宜參觀讀之。

印度支那之Karen族及揮族，至今尚有使用銅鼓者，而其使用之銅鼓

，與土中掘出之古銅鼓，大致無甚差異。故吾人正不必限於過去之遺物而僅作考古學之研究，且須兼作土俗學之研究也。

Groot 在其所著 *Die antiken Bronzepaketen im Ostindischen Archipel und umf dem Festlande von Südostasien* 一書中，曾記之如下（第九十頁）：

廣州西南部之人至遲在耶穌紀元初年即已造成銅鼓，除廣東外，經明白指出者尚有其西界之廣西及貴州、湖南各省，此吾人今日所知者也。吾人於中國書籍之中，絕不見一字可使吾人斷定銅鼓曾由他處運來也。

此說實具卓見，如氏所云，銅鼓初發生於廣東西南地方，爲其地之蠻族所鑄，後乃次第流入廣西、貴州、湖南等省。惟此等地方之銅鼓，其由他地傳入之事實，中國文獻無有記載之者。……

余於由貴州流注珠江之北盤江上游毛口附近，調查狝家使用銅鼓之情

形，所得結果如下：

吾輩與苗族 (Miao-tze) 及猓獾 (Lollos) 異，昔本不居此，明洪武時，始遷斯土。吾輩樂器無笙類，獨用銅鼓，名曰 Nan-yan 往往由土中掘得之，卽近時猶用此物，洎漢族 侵入，盡被奪去，今也則無，故乃代以無皮之太鼓云。

余調查彼等所得僅此，Hegel 於其 Alte Metalltrommeln aus Südost-Asien 中有云：

西江 注入於此，西江 發源之地在廣西北部 與湖南、貴州 交界之處，其地尙有生苗 子居之。

氏所云廣西生苗，蓋狎家 之一派；氏又曰：

關於銅鼓之事，吾人必注意於雲南省 及四川南部，因四川南部 金沙江 之曲折處，今尙有生猓 居之。

余於雲南省蠻族之使用銅鼓，情形則不甚明瞭，所知者僅夔夷 (P'oy) 耳。滇繫中云：『夔夷……滇之西南，曠遠緬平，濱海多溼。……樂有三曰：夔夷樂、緬樂、車里樂。……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用羊皮蒙三五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鏡、銅鼓、拍板……（卷十之二）』此種事實，雖尙未得承認，但據明史所記，所獲銅鼓九十餘具，其地爲四川；或則其後於深山內 猓 羅 中發現，亦未可知也。

徵之今日之事實，中國南部此時尙使用銅鼓者，均得謂之狛家。彼輩棲息於今貴州者，其主要分布地厥爲貴州南部接近廣西一帶地方。就民族血系論，彼輩與其他苗族異。據其傳說及其他苗族口中之事跡。又以地理學之位置論，其中心地似宜在廣西省。

吾人今後之工作，則在將今日使用銅鼓之狛家，與昔日鑄造而且使用銅鼓之狸 (Ti) 獠 (Lao)，作人種學上之比較研究。海南島尙有稱曰黎 (Li)

之民族，又獠族遺種廣西、貴州附近均有之。

此種比較之後，乃更進有將其與揮族及 Naren 族等作一比較之必要。

現今中國南部使用之銅鼓，全係古物，未有自行新造者，此恰爲生物學的事實；即印度支那亦不曾絕跡。仍爲生物學的事實而存在。此兩種比較研究，實給吾人以無限趣味也。

狛家使用銅鼓，已如上述，但彼等使用之銅鼓，決非今日所製造，全係土中掘出之物。……

Groff 氏云：

東印度羣島之銅鼓起源於中國長江以北之說，吾人須力闢之，因長江北之人除自南方攜來銅鼓而視爲珍玩外，固未嘗知其銅鼓也。

苟如上述，認定銅鼓絕非長江以北之物，則此地之銅鼓，在地理學的分布上，屬於極北端，而此地亦即分布之終點，渡江而北，不見銅鼓矣。

余所得之銅鼓，雖確由貴州之貴陽附近出土，但其地名甚模糊，不可辨認，余又於該省見其一具，與此完全相同。

銅鼓果在何種地方，何種狀態之下掘出乎？此則大可研究也。余於旅行之際，頗注意此點，結果毫無所得，唯聞其開墾土地時，無論丘陵或平地，均有掘出者，此外則無所知，又不幸此次旅行中竟未躬逢其新發掘地也。……